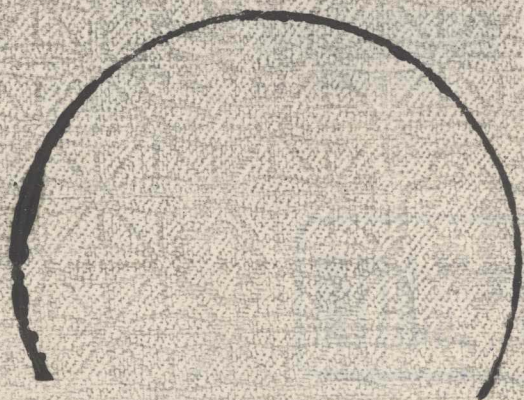


初升的朝霞

厦大诗与画社社友回忆录



一九九二年六月

第二个春天(代序)

1949年初,厦大“诗与画社”的社友在《大团圆》的气氛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自那以后,许多社友满怀战斗豪情,先后奔赴敌后游击区和一些地下斗争的场所,一别就是四十多年。由于对当年友好情谊的怀念,近年来,随着近况的相互得知,一些社友在通讯中建议组织一次重逢性的聚会,这种良好愿望实在令人向往。但是,考虑到我们只是一个群众性的小社团,去了学校不一定会接待;同时,大家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心有余而力也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又能满足社友们怀旧的心情,我同林立、孙瀚经过书信商量,于91年底倡议采取“各自成文,统一成书”的办法,编印一本《“诗与画社”社友回忆录》,以资纪念。

《倡议书》发出后,南北各地社友纷纷响应,并积极出谋献策,希望书能出成,并出得象个样子。为了不辜负社友们的期望,林立又在厦门联系对外营业的打印处,并于92年2月发出补充通知,将成书办法从原先要求各自复印改成自筹资金统一打印。与此同时,社友之间掀起忆社史、议社史、写社史的热潮。倡议人之间,倡议人与众社友之间为此进行了近百次的书信来往;为了一个时间、地点的细节在高山远水之间频频商榷;为了回忆《大团圆》照片上正坤两侧的社友姓名,牵动了许多社友的心。经过大家努力,不但弄清了这两位社友的姓名,而且连同当年没有参加《大团圆》拍照的几位社友也都一一探明了……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社友的殷情。我虽属倡议人之一,但偏居一隅,对于书的出版,只能作些精神赞助,无法参与实干。除了王学诗仍下落不明,王家甫出国探亲,三人早逝,现仍健在的十三位社友都写了回忆,为书在质和量两方面奠定基础外,书的封面是由孙瀚在设计好后用多种方法套色复印成的,其中文字部分是用借来的铅字一个一个用手工按印上去的,他为这本小书穿上一件美丽的外衣;而从通联稿件、统筹编排、安排打印到校对、装帧,则自始至终处于林立的操持之中。经过四月怀胎(1至4月成文),两月分娩(5至6月成书),现在,这本杂志式的小书终于呈现在众社友的面前了。盼望多年的“诗与画社”的社史在众社友的笔谈中也终于产生了。其中既有框架性的社史,又有不少具体生动的回忆,洋溢着一派绿叶红花交相辉映的春的气息;而且,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也达到了在社友之间重叙友情、以文会友的初衷。此情此景,不由人不联想到这是“诗与画社”第二个春天的到来。“秀才人情纸一张”,我愿代表我们三个倡议人,借此一页之地,向南北各地社友致以兄弟般的良好祝愿。

社友收到此书后,通过互相启发,可能还会追忆出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更正其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史料,仍望写往林立,让他今后继续成为我们的联络中心。如有必要,我们将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她增订再版或出版她的《续篇》。只要大家都还健在,加上交通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主要是对我来讲),我们也可能真的在旧地或另择异地携手重逢。那时候,将是“诗与画社”的第三个春天。

华 湜

一九九二年六月于云南边陲

目 录

《大团圆》照片

第二个春天(代序)

诗与画社概况	林 立	01
初升的朝霞	华 湜	04
革命摇篮	傅锡寿	06
随想	林龚亮	08
回忆与祝愿	张宗洽	10
连笔空心字	黄 榛	12
起自于诗与画社的友谊	刘正坤	14
我的感受	庄炳章	16
简讯		17
诗与画社回忆片断	林祖慰	18
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汪如泽	20
温馨的家庭 革命的熔炉	李传业	22
浪花涌溅	李毓华	24
“诗与画社”再次“大团圆”	孙 瀚	26
编后		27
社友通讯录		28

“诗与画社”概况

林立(原名林清源)

“诗与画社”是由“诗社”和“画社”合并成立的。

1947年秋,作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在祖国东南的厦门大学,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怒潮。在这个新形势下,进步的青年学生、诗歌爱好者华湜、林祖慰等,为使诗歌走出纯文艺的圈子,让诗歌与革命运动结合,发起组织“生活诗社”,张贴启事,公开征友。后经地下党有关同志指出,公开征友容易被反动势力混入,不利活动,遂即借故宣布停建。



同年11月,秋冬之交的一个下午,在当时校门外的梅林(现已不存,建为厦门大学北村),几位青年成立“诗社”。参加者有华湜、傅锡寿、林祖慰、李毓华、庄炳章、曾维琼、王家鼐、张宗诒、林清源等。鉴于上述教训,“诗社”一成立就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既不另起社名,也不选社长,参加者编了循环次序,要开会就轮流主持。当时首要任务是学习,就以循环次序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同时,还设立一本流动日记,每人用一个笔名(化名),也按同一次序轮流传写。记学习心得、活动感想、形势看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诗作交流等等。流动日记实际上成为社友的笔谈。

随着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1948年春,孙瀚、黄榛、李传业、傅锡寿、汪如泽、王学诗、林冀亮、刘正坤、郑玉光等组织了“浮世画社”,1948年秋,还有新生院的王绿枫加入,由孙瀚和汪如泽负责,社友以红橙黄绿青兰紫为代号,秘密传阅革命进步书刊。

“画社”成立不久,就在“厦门大中学生反美扶日游行示威”中,发挥战斗作用。社友按预先准备的标语口号,每人负责一个“字”,当游行队伍到中山路等地方,就按标语次序排列起来,一声令下,一起动手,在地上刷出一条大标语。又在醒目的墙上,贴出大漫画来。当时,厦大剧社正在排练《万世师表》,画友还积极帮助设计制作布景和道具。(《万世师表》后因故未公演。)

1948年秋,在地下党领导下,厦大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还促进了教师的罢教和工友的罢工,形成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友罢工三罢形势。为了进一步发挥文艺武器的

战斗作用，把诗和画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1949年秋的一个上午，在当时白城前面的沙滩上，“诗社”和“画社”集合开会，宣布合并成立为“诗与画社”。社员共18人，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院系，在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致目标下，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当时厦大学生运动中一个政治思想进步、艺术志趣相投较有战斗实力的社团。

“诗与画社”成立不久，正值工友罢工之时，社友立即投入支援工友的斗争，有的社友参加了工友的晚会，写了声援的诗歌。同时，出了《诗与画》创刊号，揭露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歌颂了工友的正义斗争。

“诗与画社”成立时，社友已有多人是地下党员。社友中秘密传阅了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阶级论》、《论人的阶级性》、《论无产阶级政党》、《大众哲学》等等。这些革命书刊，不仅充实社友的精神食粮，把社友带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也指导了社友的思想改造与革命实践，使“诗与画社”的活动起了质的飞跃。

“诗与画社”为此还组织了几次生动活泼的讨论会。有一次，以爬山郊游为形式，在万石岩寺组织了《关于人的阶级性》学习讨论会，会中，由某一位社友谈个人的出身经历，然后大家发言，共同分析他的阶级根源、环境影响和当时思想性格的关系。还组织一次讲演会，有的社友在讲演活动中批判了自己的家庭，宣告与旧势力彻底决裂。这些，给社友受到一次阶级启蒙教育。

《诗与画》壁刊，由于内容紧密和学生运动、校内外形势结合，形式上又是诗配画、画配诗，生动活泼，编排新颖独特，吸引了很多读者，起了较好的反响。

“诗与画社”为学生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朗诵诗、活报剧、大标语、漫画等材料。1949年元旦晚会，社友创作的集体朗诵长诗《迎接人民的春天》，由中文系朗诵，不仅在厦鼓学生中受到欢迎，后来还被晋江旅外大专同学会在泉州传诵过。李毓华在一次活动中，朗诵了林祖慰的诗《某夫人的咀脸》，黄榛为嘉庚阅览室赶画了鲁迅、闻一多、陈嘉庚邹韬奋的挂像。李传业画了《驰马向黑暗投枪》作为工友夜校的标志，以及孙瀚的漫画《美军滚出中国去》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历次运动的大标语、宣传画多出于社友的手笔，历次晚会的灯光、布景、化装，也多是社友绘制和操作，甚至黎明歌颂

会，广场队伍行进的鼓点也是社友黄榛司鼓的。

“诗与画社”的公开活动增加以后，为便于集体交往，1948年冬就在同安楼的一个教室建立活动室，社友经常在那里交流诗画作品，交谈学习心得。1949年春节前农历除夕，正是淮海战役结束之时，留校的15位社友，怀着兴奋的心情，自带炊具和晚餐，在活动室聚会，有的朗诵诗作，有的携带画作张挂在教室墙壁上，还合照一张写有《大团圆》三字的相片，过了一个轻松活泼、兴趣盎然的送旧迎新的除夕。

1949春，为响应地下党关于“到群众中去”和“社团系统化、系级社团化”的号召，“诗与画社”宣布此后不再进行集中活动，要求社友分别到各自的系级活动，只继续出《诗与画》壁刊。另外，还编印过一本几位社友撰文的《论知识分子》的油印小册子。

“诗与画社”停止集中活动后，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更多会写美术字的人才，写会标、写标语、刻印小册子和传单，学生自治会举办了美术字培训班，也是由社友担任培训指导，使原来只是少数同学擅长的美术字，更普及更群众性。

在地下党的直接教育培养下，在学生运动斗争实践中，社友们成长了，至1949年4-5月间，“诗与画社”社友已有三分之二先后成为地下党员了。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地下党直接安排下，大部分社友到游击区参加战斗，或到农村开辟新区，迎接解放。少部分留校的社友，与全校师生一起，开展护校斗争。1949年5月，由林清源、曾维琼、汪如泽等编辑出《诗与画》壁刊第5期——也即最后一次活动。汪如泽画的刊头《同舟共济》表达了师生员工力挽狂澜，保护学校，战恶浪，迎解放的英勇气概。

（由于难得集体讨论的机会，这篇《概况》多凭个人记忆写成，难免有误，请社友批评指正。）

1992年2月。 ■

初升的朝霞

回忆“诗与画社”的几种活动方式

华 湜

“诗与画社”是十几个爱好艺术、追求进步的厦大青年学生，在白色恐怖下组织起来的小社团，她的活动既带有半公开半秘密的性质；又有点文运的味道；还很注意适应青年人爱好友谊的特点，重视联络感情，在欢快的气氛中从事严肃的学习和工作。而今，在党的公开领导下生活了几十年，我还常会怀着温馨的感情，去回忆那些美好的往事，就象站在西山望见东方升起的朝霞。



首先想起的是传阅进步书刊。那时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从事革命理论学习，但由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这方面的书籍很少，更不能公开阅览。大家开始时是在知己之间相互传阅，以后成立了诗社，就将社友编一个次序，谁弄到好的书刊，就将它按次序往下传，循环到自己时才收回去。这样，我们先后传阅了《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论无产阶级政党》、《阶级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从香港翻印的解放区著作，它为我们打开了心灵的窗户，使我们这些长期在压抑中生活的人沐浴到新鲜的空气和阳光。

最有文运特色的活动方式，当推书写《流动日记》，交流思想和学习，也在上面撰写作品和评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日记》仍按同一循环次序，传到谁，谁先把大家写过的看完，然后自己接着往下写。举凡不便公开说的心里话都可在此一吐为快。那时很爱进步，真心希望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改正的方向。我记得祖慰在一次日记中专门评论诗友的诗作，说我写的诗“有田间的派头，无田间的风格”。我看了丝毫没有反感，觉得他是在真诚地对我帮助。此种日记写过两本，可惜早已失传。

大约经过数月至一年，诗社与画社合并。除了继承上述好的传统，到了49年初寒假，为了使合并不久的社友密切联系，增进感情，我们在同安楼二楼西角的教室设置了一个活动室，取名为“诗与画社活动之家”。社友们每天有事无事都要到“家”里去走一趟，在那儿无拘无束地交换书刊、作品和对形势的看法。毓华还借出她代管的一份《江声报》供大家阅览。全社在那儿开过多种会议，组织过诗、书、画展，编过社刊。最后一次会上决定：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将社化整为零，让大家冲出小溪，汇入洪流，以个人名义参加到全校的各种“迎春”活动中去。会议结束后就照了那张“大团圆”照片。

我们还组织过一些别开生面的讨论会，在欢快中进行严肃的学习。我记得在“活动

之家”开的一次演讲会上，各人联系实际畅谈学习收获和思想认识。有一社友在会上联系自己家庭讲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鲜明地表白了她反封建的立场。我当时听了立刻联想到巴金的《家》。还有一次是在万石岩寺讨论《人的阶级性》。会上以我为分析对象，先由我介绍家庭出身和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然后大家分析我现在的思想、性格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当时不可能做得深入，但它显示了正确的学习方向。去时是组织登山活动，从南普陀寺后山翻过去，再从中山公园边回到学校。

以上几种活动是着眼于社友的自我教育和提高。但我们没有停止在这一层次上，我们还配合当时学生运动，作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当中最主要的、作为社务活动中枢的是出《诗与画刊》。诗友和画友在此既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又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内容上尽量结合形势，讽刺美蒋反动统治，热情歌颂祖国的未来；形式新颖别致，艺术细胞较多，刊面琳琅满目，很为当时同学们喜阅。社刊共出五期。创刊号正值学校工友罢工，那一期就以大量篇幅向他们表示声援。毓华和孙瀚分别担任诗与画的主编，临时编辑室就便利用囊萤楼下的化学资料室。终刊号据清源说是在49年5月出的。那时毓华、锡寿、家簋、黄榛、孙瀚、炳章、祖慰、龚亮、宗洽和我等人已先后离校，是清源和维琼有始有终把原来未用完的稿件编辑而成的，汪如泽为它画了刊头。

此外，孙瀚、黄榛等画社的同志一两年来为学生游行和集会创作了大量漫画，写了许多标语，为晚会和未演出的《万世师表》化了妆、制了景。诗社的同志为晚会写过一些活报剧和朗诵诗。现在记得的有由我改编交化学系在49年元旦晚会上演出的活报剧《群魔乱舞》，有由祖慰、维琼和清源集体讨论，由清源执笔写给中文系在同一晚会上集体朗诵的长诗《迎接人民的春天》。还有，辑录了几个社友写成的几篇思想评论、在映雪斋208室油印成的《论知识分子》的小册子。文集既称赞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又认定了也有接受党的领导进行自我改造的必要性。不知是谁在其中写了一篇批评那时学运中为了便于在蒋管区流行，把《你是灯塔》歌中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改成《勇敢的中国学生们》来唱的错误，这在当时算是很有见识的。这些都是“诗与画社”决定化整为零、以个人名义投入到群众的“迎春”活动中去后的新气象。

“诗与画社”之所以产生以上一些活动方式(传阅进步书刊、书写《流动日记》、设置“活动之家”、组织学习讨论、出《诗与画刊》、参加“迎春”活动)，是同当时厦大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关怀和指导分不开的。有些是同他们作过商量，有些(如后来的“化整为零”)更是他们出的主意。因此，这些活动在这个小环境里完全是公开的，但在整个学校的大环境里则是保密的。可惜我的回忆极不全面，远未囊括所有社友的事迹；但仅凭这些点滴回忆，也足以说明，我们在年青时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

革命摇篮——“诗与画社”

傅锡寿

我对“诗与画社”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既是诗社的成员，又是画社的成员，很自然就会产生以诗配画、以画配诗，将诗社与画社联合起来的设想。在我的建议与媒介作用下，诗社与画社合并成为“诗与画社”。



诗社是由华湜倡议创立的。有一次华湜说要给诗社取个社名，大家想了好几个社名都不满意。最后我提议取名生活诗社，因为生活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使读者懂得了生活的真正含义，生活诗社也是为了使大家懂得革命的人生，而“生活”这两个字又比较含蓄，取做诗社社名比较合适，得到大家同意，这就是生活诗社社名的由来。后来记不清是谁为了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议生活诗社公开招收社员，大家觉得有道理，就贴出了通告。没料到几天后华湜说不好了，有“牛”要闯进来了，大家赶紧商讨对策，决定由我和几位同学假装也是应招报名的人，参加开会时在诗社活动日程上搞分歧，使会议最后决定自由写作而不成立诗社，实质上取消了公开招收。但生活诗社的名称不好再公开使用了。好不容易取出的好社名停用了，我感到若有所失，真太可惜了。后来建议与画社联合成为诗与画社也是个弥补。

画社是由孙瀚倡议创立的。在反美扶日运动中，画社组织了街头漫画宣传，事先每人分配刷一个字，分散出发，到了指定地点，一声令下，大家就按预定顺序排成一长行，每人在地上刷写一个字，一下子就刷出一条长幅标语：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刷写完毕立即转移到另一地点再刷第二幅标语。刷完标语后各自分散画漫画，我专找人多的地方挤进去在地面画一个日本鬼子，然后宣讲反美扶日。厦门市民深受日军侵略之苦，积极主动支持宣传，他们让出空间给我画漫画并协助我退出人群和转移。反美扶日运动结束后，孙瀚对我说，毕业班同学走后，我们要进一步组织起来承担今后的宣传任务，暑假中大家找机会接触工农劳苦大众，多收集一些素材。1948年秋成立“诗与画社”后，出《诗与画》刊，以诗配画，以画配诗，更富有战斗力。

“诗与画社”是我学习马列和实践锻炼的革命摇篮。这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记得阅读过的有《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社会发

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联共(布)党史》……。这些书刊都是秘密传阅的，时间很紧张。记得有一天晚上轮到我看《联共党史》，次日就要往下传，我只好开夜车。看到深夜，忽听远处传来阵阵皮靴声，恐怕是“牛”来了，急忙出去将《联共党史》隐藏起来，后来皮靴声伴着阵阵笑语声过去了，原来是一群同学夜游晚归，安然无事。除了书刊有时还传阅报纸，淮海战役期间组织时事学习，分配我先看华商报，消化整理战况，然后向大家讲介战况和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我们还学习了“论知识分子”，并由林立(林清源)主编了一本油印小册子，第一篇就是林立写的“论知识分子”说明过去的士大夫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我们青年进步学生要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我也写了一篇：“厦大学生的道路”，还有其他几篇记不清了。

后来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要求“诗与画社”分散到系级去活动，当时我被选任啄木鸟歌咏队学习组长，负责组织进步同学的学习(廖开治被选任生活组长)。但是“诗与画社”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例如在教师罢教，工友罢工，学生罢课期间，我们全力配合宣传。我听了工友们唱的：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不禁热血沸腾，当即写了一首为工友们呐喊的朗诵诗，由修省陪同我去夜校组织工友排练。他们在晚会上朗诵，呐喊：我们要有自己的政府……。

“诗与画社”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是一块里程碑，通过这期间的学习与实践，我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心献身于党的伟大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于1949年4月提前离校从事专职地下工作，迎接解放。 ■

随 想

林 龚 亮



梦境是朦胧的，梦境是凄迷的。岁月风雨的鞭打、剥蚀，令往事消瘦，如烟如梦……

(一)

那是一个寒冷而又美丽的冬日。我即将离开这一个“家”，去远方。

教室里气氛是热烈而又温馨的。大家忙着倾溢美之词藻于片纸，然后用一丝绣带串结篇章，附一页封面的装帧。记得那封面上写着赫然三个大字：“好兄弟”。还横卧一支麦禾写生。

“一粒麦子落地，一支麦禾新生”。

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的兄弟们。

我扬起兄弟给我的嘉禾，独旅长程。

在越过四十三度春秋之后，麦穗新生了吗？

“麦穗新生了吗？”我问我自己。

(二)

端坐在杏林湾西畔高楼眺望，今朝，那视线越过空间，落入母校美丽的建筑群中，那视线又恍惚穿越时间的层层魔障，落入十五位少男少女群的情影之中。

绽放得鲜艳而又素雅的是芍药花呀，灵活啁啾一似小燕子的是坤，枫的清秀飘逸，令人想起大明湖畔惹人怜爱的垂杨。

我多么欣赏泽和源的潇洒，锡以敦厚著称，慰给人干练感，章的儒雅风度很超然，业的薄唇，定能鼓舌如簧，瀚的闪烁如星的那孩子般双眸和榛活泼身姿给人的快意和勃勃生机。诗和琼却展现清和醇异曲同工般的笑容，谱写了宫和羽。那么，谁是这大家庭乐队的指挥呢？落在落落大方有长者之风的湿的肩膀之上了。

湿呀，为什么您不能，不能招风唤雨？把时光扳倒，令岁月倒流，能又一次地在南强学斋——囊萤楼上，重新指挥一曲大团圆之歌呢？

(三)

大家庭里人才辈出，却出了一只大呆鹅。

在家乡，我也曾博得人们一赞：名邦俊彦。但是，在这群星璀灿的眩眼下，我就显得笨拙了，如笨鸟。

“那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怎样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呢？”

愚问，彻头彻尾的愚问！这是一次我绝无仅有、愚不可及的发问。每逢小组会，我聚精会神，眼观口若悬河的语流潺潺，耳听妙语连珠的声声入扣，唯有我金口难开。不是不想发言，只因笨头笨脑笨肚肠，一句话经过一斟二酌三思量，经过九曲回肠的段段纠缠，正要破口而出，他人早已接话，铄羽之势已成。多么象爱罗先珂这位盲诗人儿时课堂上的发问呀，他发了问，教师说是愚问，等待他的是一顿手板或一场呵责。此刻，我的傻问，也惹得一场笑声，没人解围。当然，此刻谁也无此能耐，无能进退裕如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谁能逆料日后的一场嬗变呢？

(四)

最饶有兴趣的是虎溪岩之游。

记不清如何进入这一奇境。只觉好像是脚著谢公履，夜探仙源境般出神入化，神秘莫测。山色如晦，怪石嶙峋，绿林映趣，一群童男童女在林间奔走嬉戏。

我的画兴大发，执笔素描。

正坤小姐款过来。“唉呀”，她惊呼指着画本，“丑死了，把我画成老太婆。”她咕咕地笑开来，我尴尬地也破颜而笑。

四十年后我访问刘，无法找到当年画本，否则，我会理直气壮对她吼：“怎样，不委屈您了吗？！”我定会抛下一阵嘎嘎的笑声了吗？！

(五)

我能这样坦然吗？笑傲人生！我能这样洒脱吗？驭风而行。我的人生是掠过荆棘丛生的林间小路。过去岁月，如野径衰草，不堪一睹！偶而，有那么几朵小花，我会无比珍惜地小心采摘，藏入心屋暖坛。感谢林立、孙瀚、华湜兄，他们的倡议，激起我苦寂的心湖成轩然巨波，那一朵朵洁白的记忆浪花，扬起那是从千年古壁上冲泻而下的飞瀑！斑斓多彩，蔚为奇观！呵，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往事涌入胸臆，声势澎湃不可遏止！兄弟们，我好思念您们哟！鼓岛的篮空何时能银光闪烁？那时告诉我当年的北雁南归，告诉我鼓岛的沙滩上又将白鹭云集！是吗？

1992.4.13夜于杏林湾畔 ■

回忆与祝愿

张宗洽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我提笔想写这篇回忆录时，心中自然而然地想起苏东坡这几句诗来。诗人说得多么好啊！人生确实有点像飞鸿，征途在何方，归宿又在何处，实在颇难预料，飞鸿在雪泥之上偶然留下了爪痕，但顷刻之间，它又往前飞奔，再也无暇去回顾一下自己留下的足迹了。话虽如此，但人毕竟与飞鸿不同，特别是老年人，忆旧的情绪似乎更为强烈。回忆四十多年前风华正茂时追求光明的一段历史，重温友谊，毕竟是令人心醉的。

1946年秋，我考上了厦门大学。由于中学时就爱好文艺，特别是诗歌，上大学后虽然念的是法律，但对诗歌的兴趣依然很浓。功课余暇，继续浏览诗集，学习创作，并向《星光日报》投稿。对闻一多、朱湘等诗人，尤感兴趣。1947年转至校本部，认识了同乡同学林文治。当时学运高涨，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积极参加学运。在这期间，自然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切磋诗艺，以文学为武器，献身革命事业。林文治较早就参加地下党，同乡进步同学往往把他当作老大哥。他知道我倾向进步，又爱好诗歌，有一次，问我想不想参加一个诗社，我欣然答应了。有一天，林文治带我到学生宿舍去见一位理工科的同学、高个子，林介绍说：“这是华湜同学，诗社的负责人。”我从此认识了华，参加了诗社，时间大约是1947年下半年的某月吧！

我在1948年底或1949年1—2月间，在念了两年半大学之后，因肺病发作，便休学回莆田养病。所以后来诗社和画社合并时，我已不在厦大。现在我能记忆的诗社社友除华外，有：林清源（林立）、林祖慰、庄炳章、李毓华、王家鼐等人。王家鼐与我同系，他的一口浙江话，我经常听不懂，印象很深。李毓华是唯一的一位女性，豆蔻年华，人品出众，自然不易忘记。林清源后来在厦门文化部门当领导，我也在文化部门的郑成功纪念馆工作，接触最多。庄炳章与我都是搞文博考古的，也时有过从。林祖慰我虽然知道他在泉州工作，但没有来往。有一次我至德化瓷厂购买瓷器，看见一个人极象他（但

苍老了不少)，我不敢贸然打招呼，事后经打听，知道他确实曾下放德化瓷厂。失之交臂，深感遗憾。后来我给他去封信，但未收到回信，大概他已落实政策调走了。至于林汉，一度在省文化厅文物处工作，算是我的上司，但因我在厦大时不认识他，只是后来听黄榛同学讲，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画社的负责人孙瀚，他对我大概也没有什么印象吧！

在诗社的活动中，许多都已淡忘，尽力回忆，还有下列几个片断的印象。

有一次，讨论诗社的社名问题。有人（可能就是华湜）提出可名为“生活诗社”。我个人感到很合适。一、这名称不太有刺激性，不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二、诗本身离不开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诗歌之源泉。诗社取名“生活”，很好。

有一次，在集美楼（或同安楼）二楼排练诗朗诵，大家排成一行，每人接着朗诵一段。开头朗诵不理想，姿势也不大对头，华湜作了指导和示范。这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华虽不是念文科的，对这方面倒满在行呢！

有一次，酝酿选举各股负责人。当时有三青团分子想混入诗社，我们担心敌人从中破坏，为防止诗社领导权旁落，所以秘密开会，对各股人选进行研究，以便选票集中。记得好象是要我参加出版股，但投票时，我爱面子，不投自己的票。所以开票时，一切如原来的计划，只我少了一票，个中原因，我自己最清楚。

有一次，是商量各人的笔名，做到对外不用真实姓名，都用笔名，但在诗社内部，都知道作者是谁。我自己选定的笔名是T.S.解放以后，我写文章，未再用这笔名，一般都写真名，间或用张夏或钟侠的笔名。

诗社出过壁报，我登过一首，题目我已忘记，大意是说过去我是一个寂寞的人，现在我有新的生活，不再寂寞等等。当时可能受何其芳诗作的影响，有点模仿他的风格。

四十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往事如烟，尽力从记忆的仓库中去挖，也只剩下这零零碎碎的片断了。所喜的是，大部分社友都还健在，虽然天各一方，聚首为难，但把大家的回忆文章凑成一集，互相传阅，重温友谊，在垂暮之年，总多少可以减少一点相思之苦吧！

最后，仍然想以苏东坡的另外两句词，对社友们致以深深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连笔空心字”

——一种战斗的艺术创作

黄 榛(现名赵凌)

诗与画社留给我的诸多记忆里最深的莫过于孙瀚同志创作的“连笔空心字”了。这种字在解放前厦门学生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战斗作用，尤为可贵的是它蕴含了我们诗与画社的战斗艺术创造精神。当年在厦门大学校园的壁报上，隆重的学生集会的大会标上，那高擎在雄壮的游行队伍前头的大横幅上都可见到醒目的“连笔空心字”。



“连笔空心字”与其说是字，不如说是一种画。它是画成的，而不是写成的。同时它又是地道的工艺品。这种集字、画、工艺于一体的创作典型地体现出当年奋战在解放战争第二战场上的革命学生的特点。同学们的革命激情转变为革命行动往往是极其迅猛的。例如，反美扶日运动时，群情激愤，从组织游行到游行队伍出发，时间很短。要在几个钟头里把大横幅，大量标语牌和招贴画等全都准备停当，慢条斯理是不行的，这就要求“快”。可学生的革命行动又经常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一张纸一块大布，甚至一根大头针都是珍贵的。必须让有限的物质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这就要求“省”、因陋就简。“连笔空心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这种字的笔划之间不留有空隙，是连成一体的。画成后，只需将字的周围剪去即可。然后用大头针别在大布上，一条大横幅、大幅大会标就做成了。用过之后，拔下大头针，大布和大头针仍可反复使用。既省时又省钱。“空心字”有大布的衬托，既醒目又大方、美观。

“连笔空心字”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字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可宽可窄，没有定规。它吸取了隶书、楷书、仿宋等字体的特点，但又不是单纯的隶书、楷书或仿宋。它如同漫画、杂文一样服从斗争的需要。可以对旧社会黑暗统治揭露、讽刺、批判、否定；又可以号召、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斗争，并歌颂美好的未来。例如，一九四八年三、四月

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伪“国大”，选举伪总统。在揭露这场丑剧时，壁报上的“国民大会乱纷纷”的“空心字”字样是大小不一、歪歪斜斜，令人产生鄙夷的心理。又如一九四九年春，厦门大学全校在大操场上举行“黎明歌颂会”，那高高竖起的大屏幕上五个大字规整、粗壮、字端不带棱角，表达出革命师生对光明、自由的渴望，对新社会的向往，其感召的力量是多么大啊！几十年过去了，至今犹激动人心！

“连笔空心字”的作者孙瀚同志，他是学经济的，但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雕塑、摄影等方面也颇有功底，并有自己的独创。他的汉字龙飞凤舞，自成一格，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热情奔放。在厦门的学生运动中，他初露锋芒。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后，就在华湜同志、傅锡寿同志离开厦门大学的第三天，他奉命到达安溪游击区。从那以后，他转战安溪、南安、漳平直到闽南地区解放。在当时游击区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正是他首次把毛主席的木刻像加以放大，让闽南人民早日见到了领袖的光辉形象。随后的闽、粤、赣边第八支队第四团的宣传品、标语、小册子和红臂章上都留下了有他艺术才能的印记。四十多年来，孙瀚同志始终坚持了当年我们诗与画社的战斗创造精神，在党的宣传、文艺战线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健在的所有的诗与画社社友和已故的曾维琼、王绿枫、郑玉光的深深思念！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夜深 ■

起自于“诗与画”社的友谊

刘正坤

我参加“诗与画”社时间很短，只是48年后半年、49年初那几个月里的事情。往事依稀，多已忘却，但有一事，虽经四十余载却一直没能从我心头抹去。

我不会做诗，也不曾作画，却参加了“诗与画”社，说来也挺有趣。记得小时候常侍立在画桌旁静静地看父亲作画。父亲是个山水画的爱好者。也许是耳濡目染，我喜欢看人作画。正因为此，我参加了“诗与画”社。



“诗与画”社定期出自己的诗刊与画刊。我记得孙翰和黄榛同学的漫画很是出色。一张宣纸，在他们手下，仅寥寥数笔，便把反动派的嘴脸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诗与画”社的画刊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精神。这在当时，犹如黑暗的夜空中划出一道光亮，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同学。我虽不会作画，但每每当我提着浆糊小桶与社友们一起张贴画刊时，竟也为自己是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诗与画”社成员不多，但同学之间的互学、互爱、互助、互励精神着实令人感觉温馨。印象最深的是“诗与画”社的学习会。那时，社员聚会，或介绍自己读书心得；或谈论理想、人生。记得华湜同学曾谈及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今后奋斗的道路。是他的话触动了我。于是在一次学习会上，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众多的人们面前畅开心扉，吐露了我的身世，倾诉了我的心怀。

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有个封建的家族，父亲是个小官僚。我的家，同巴金的小说《家》有着类似的情景。表面上是个书香门第，可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终日不得安宁。我恨透了这个家，但我还不能自立，我得依赖家庭供我读书。我只能逃避，远远地躲开那个家，来到厦门大学读书。在厦大，我接受了新的教育。我认识到，我的家同成千上万个地主阶级的家一样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养活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我必须背叛这个家，走自己的道路。

我的发言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他们对我表示支持。曾维琼同学说，一个人的出身